

金城银行的兴衰沉浮（下）

■ 王丹莉 王曙光

上海解放后，为稳定金融扶植生产，华东军区司令部公布《管理私营银钱业办法》（详参《解放日报》1949年8月21日），金城银行遵令登记和增加资本，金城银行虽仍处于举步维艰的状态，解放前恶性通货膨胀所遗留的问题仍很严重，但对人民政府维持金融稳定的信心已经开始逐步确立。金城银行1949年12月8日举行行务会议，在会议总结记录中写道：“目前一般私营银钱业处境大致相仿：（一）金融资力薄弱，各行庄经过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搜刮，本身力量均已十分脆弱，而存款数字与战前相较尤为渺小……（二）历年通货膨胀，人民久已养成重货轻币及



高利贷心理，各地解放后，人民币币值虽已稳定多多，但社会一般习惯，未易立即消除，以此银钱业存款利率仍极高，物价稍有波动，头寸立感异常紧俏。（三）近年同业竞争之剧烈，已趋白热化，正当行庄业务的发

展极受影响。基于上述三因，我人欲以商业性的资金来从事于较长期性的工业投资或贷放实有困难……政府近来已严厉取缔地下钱庄，以充沛正当行庄存款资金的来源，成效当可渐著”（《金城银行史料》，921页）。从此记录透露出的语气来看，金城银行此时的心态正渐趋积极光明，对自我的认知和对时势的判断也逐步清醒和理性。而此时的人民政府，对银钱业的整体判断也异常犀利和准确。1950年8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非常深刻地指出：“中国银钱业过去的发展是畸形的……由于中国民族工商业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长期的压制与摧残，以

瓣边沿开始泛黄，内里出现黄色斑点，直到……一朵花的周期大约是十天。

开了两朵花的时候，心中大喜。这份喜悦当然要和朋友们分享啊。发一条朋友圈，收到好多留言。原来不少朋友喜欢栀子花，且大多有着和我相似的买花经历，买了再买就是养不活。有一位朋友养了三年，这大概是我们中的高记录了。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这一次我去查看了栀子的生长习性。原来它喜酸嗜湿爱光，难怪干燥的法国不常见而潮湿的家乡很普遍。阳光不在管理范围，种在向阳的地方就好；酸也好办，可以加酸性肥料；这湿度，我除了浇水还能如何？且种且观察吧。

写下这些文字，只为这“棵”栀子的未来留下最初的见证。如果它能侥幸成活，那么我的乡愁就会因此而又减少一分。

其实随着地球村的扩建，物质的乡愁已经不多了。

曾经，乡愁是放假时带着家乡罕见的物品急迫地归家，开学时带着妈妈的“味道”恋恋不舍地返校；跨过大洋后，它是一长串蔬菜名：莴笋、莲藕、黄豆芽……最初，榨菜蛋汤就是稀释乡愁的上等佳肴，后来朋友成功种出莴笋，再后来华人超市有了空运来的莲藕，最后温州人开的超市里有了黄豆芽、新鲜豆腐、火锅料……现在如果有国内朋友来巴黎问起想要点什么吃的，还真是想不出什么特别馋的了。

然而，精神的乡愁无色无味无形，唯有任其时而漂浮时而沉潜，一生都将会挥之不去隐隐地萦绕心头。如果没有这份乡愁，人生是否同样是缺失的？

萧伯纳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那么在“没得到”和“得到”这两个点之间的过程，就是我们的快乐之旅，于是化解乡愁的过程是值得我们去经历的。□

致银钱业不能与工商业相结合，而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所胁持与利用。帝国主义利用银行钱庄在我国收购土产，推销洋货；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四大家族通过银行钱庄搜刮财富，筹措内战军费。银行业麇集上海，大部依靠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追求公债、金银、外币和房地产等投机的利润。抗日战争以来，通货膨胀绵延十二年，人民困苦加深，正当工商业凋敝，然而银钱业却呈现畸形的繁荣。当时的这些银钱业，或直接参与投机，或与工商业中的投机经营相联结，因此，他们的发展与繁荣，是建筑在投机的基础之上的。投机与暴利腐蚀了银钱业，使他们盲目地扩大机构，增添人员，提高待遇，铺张浪费；逐步脱离了对正当工商业的联系，更脱离了人民。这一发展与繁荣是虚假的，造成了银行机构在大城市的畸形增加，在中小城市则急剧减少。”这篇精彩的社论，对抗战前后银钱业经营的状况和困境进行了极为精到的分析，验之于金城银行，也相当恰切。新中国成立之后，金城银行的经营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银行对金城银行等私营银钱业的困难加以周济，1950年4月12日徐国懋给周作民的信中写道：“我行存款自三月底起……骤告跌落……以致每日轧缺，深感拮据。此在目前固不止我行为然，同业中如……或更有甚焉。所幸人行已洞悉艰难，对我行等皆特予协助”（《金城银行史料》，925页）。

在新的形势下，金城银行开始改变经营方向，致力于工商业贷款，此间金城银行曾联合十四家银行组织放款集团，对上海永利化学公司进行联合放款（《金城银行史料》，927页）；

金城银行还开办小本贷款，支持小型工厂、家庭工业和小本商贩的经营，并与浙江兴业等十八家行庄组织“农贷联合银团”，支持农业贷款，并派员下乡实地调查农村经济情况，开办农贷学习班，使职工熟悉农村情况和农村信贷情况。这些举动，都表明金城银行基于对时势的崭新判断，开始进行战略的深刻调整，开始对工商业（包括小型工商业）和农民进行贷款支持，其业务方向逐步走上了正轨。1950年8月，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在团结公私金融业力量、共同扶持生产的前提下，详细研讨了调整金融业和工商业的关系、调整金融业的公私关系以及调整劳资关系等问题，使金融业能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解放日报》1950年8月25日）会后行庄感到政府不但指出了道路，而且调整了公私关系，给行庄以转抵押、委托业务、汇兑折扣等支持，信心逐渐恢复，一些行庄（上海、浙兴、金城、大陆、中南、国华、聚兴诚、和成八家）要求政府接管属于依法应予没收之敌伪股份并指派公股董事，人民银行亦同意其申请。人民银行向金城银行派了两位公股董事（人民银行华东区行行长陈穆和人行总行设计计划处处长曾凌），1950年8月14日董事会改组，陈、曾两位被选为常务董事。1951年，经过经营方向的调整和人事的调整，金城银行的业务逐步好转，存放款均逐月稳步递增，开支节减，扭转了亏损局面，收支基本恢复平衡，到下半年并有盈余，使金城银行上下各感振奋。1951年9月，公私合营“北五行”联合总管理处成立，公私合营“北五行”联合董事会董事长为周作民。金城、盐业、大陆、中南、联合五家银行从此不再是单纯的

私营银行，而是有着国家投资并由国家派遣干部同资本家共同经营的国家资本主义高级形式的银行。（《金城银行史料》，912页）1952年11月，包括公私合营“北五行”联合董事会在内的五个公私合营银行联管总处，向人民银行申请组织公私合营银行，自此私营金融业实行全行业合营，60家行庄组成公私合营银行，联合董事会推举周作民为副董事长，金城资方有五人任董事，12月成立联合总管理处，并由周作民副董事长提议，总管理处于1953年5月5日由上海迁移北京。在此间进行的对金城银行的清产核资中，金城由于对工商业投资较多，清估结果，比原来的股本竟有升值，使周作民深感宽慰。根据徐国懋1960年的回忆，周作民曾说，他主持金城几十年，最后有这样的结果，对股东也算是对得起了，若不是公私合营，人民银行的大力支援，我行的问题真是无法解决。言下之意，对政府的措施，他衷心感激。（《金城银行史料》，1001页）

私营银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标志着金城银行的历史使命业已完成，金城银行作为我国民族金融业的代表，自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金城合营后，周作民将自己持有的金城银行以及其他合营银行股票及私藏书籍捐献公私合营银行董事会。1955年周作民在沪因心脏病突发逝世后，其在香港的全部财产和私藏文物皆遵其生前之嘱捐献国家。周作民作为我国民族金融家的杰出代表，其风雨一生，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王丹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曙光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